

2008



立信论坛

《立信论坛》编辑委员会 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立信论坛

(2008)

编辑委员会

主任：桑秀藩

副主任：唐海燕

委员：楼军江 朱坚强 邵瑞庆 李延臣

胡厚麟 曹惠民 张维宾 黄明

黄汉江 桂芳 黄瑶

主编：唐海燕

副主编：邵瑞庆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信论坛. 2008/《立信论坛》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429-2184-0

I. 立… II. 立…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834 号

责任编辑 方 辉
封面设计 周崇文

立信论坛. 2008

出版发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电 话	(021)64411389	传 真 (021)64411325
网 址	www.lixinaph.com	E-mail lxaph@sh163.net
网上书店	www.lixinbook.com	Tel: (021)6441107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43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29-2184-0/C·0037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订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经 济 管 理

- 空间维度中的公共产品效用与级差地租新解····· 李延均(3)
- 储蓄(消费)理论的历史演进及述评····· 陈 兵 李 莉(9)
- 中日知识经济思想的引入及其内容比较····· 胡翠华(17)

社 会 研 究

-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创新····· 杨林林(25)
- 略论傅斯年与中国实证主义史学····· 孔祥成(30)
- 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历史经验····· 周铁水(34)
- 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看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 邓 君(39)
- 论周恩来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当代意蕴····· 王守杰(43)
- 世界红卍字会在“一·二八”抗战中的救济工作····· 曹礼龙(49)
- 老年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中的应用探讨····· 林 典(54)

法 学 探 索

-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评析····· 孔志强(63)
- 关于税收犯罪增设资格刑的问题····· 吴志宏(68)
- 试论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世界银行的关系····· 金慧华(73)
- 浅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行为的效力····· 赵 鹏(85)
- 绿色壁垒的再认识与我国的法律对策····· 赵 峰(88)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李 政(97)
- 高校辅导员的绩效评估初探····· 邓 娜(101)
- 高职学院专科层次大学生党员思想状况调查与分析研究····· 梁 臻(105)
- 和谐校园视域下新升本科院校党员教师思想动态分析····· 王 妍(113)
- 对高校学生会队伍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朱 盼(117)
- 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潘宏凯(122)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切入点 胡荣荣(127)

语言文字

- 《比较大学语文》初探 施 扬(133)
- 接尾词「向き」「向け」「用」「宛て」的异同 张慧荣 金 玉(138)
-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on English Speech Scripts Made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Zhu Juanjuan(143)
- 英语中中文借词现象探析 杨 恸(153)
- 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与网络英语 徐启龙(158)
- The Stylistic Analysis of Dialogue in Arthur Miller's *Death of a
Salesman* Zhang Yingying(165)
- 论大学生英语语法技能的培养 陆 艳(174)
- 另一种复杂不凡之美——解读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 承 华(179)

教育教学

-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视角 黄家瑶(187)
-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要因分析及启示 刘晓红(191)
- 会计教育目标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途径探讨 张玉英(197)
- 财政学案例教学研究 王晓玲(202)
- 论思政课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洪光星(209)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法探讨 李玲芬(215)
- 关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刘 燚(219)
- 体育教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陈芝峰(224)

高校管理

- 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校园文化整合 汪雪兴 卢 璐 李湖生(231)
- 高校党组织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管理研究 翟孝强(238)
-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校学风建设着力点探析 薛 芳(246)
- 对立信体育俱乐部等社团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汤伟康 宋灵荧 刘富密 闻 雅(251)
- 高校共青团基层支部建设的调研 牛媛媛(258)
- 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档案信息化建设 李 益(264)
- 论高校体育消费市场需求及其特征 刘国荣(269)
- 图书馆在创建和谐校园建设活动中的作用 李湖生 卢 璐 凌慧义 周慧芬(273)
- 基于我馆开展总台服务管理的若干思考 吴湘萍(279)

经济 管 理

空间维度中的公共产品 效用与级差地租新解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财税学院 李延均

【摘要】 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学的理念和分析方法,将公共产品引入空间维度,考察公共产品效用在空间形态中的场效应梯度、外部空间聚集效应、效用空间的复制性与独占性、效用空间的进入成本等问题,并尝试从这一新的分析视角获得的公共租概念来解释级差地租的新现象,以为进一步研究公共产品开启新的视野。

【关键词】 公共产品效用空间;场效应梯度;独占性效用空间;公共租

一、引论

自1954年缪尔森定义并证明了公共产品概念至今,有关公共产品的理论体系已相对成熟,但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而未从空间角度对公共产品作出系统性的考察,仅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论及,如全国性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划分,共同消费中的拥挤点等。蒂布特较早注意到了地方公共产品在空间上的差别,并将空间差别作为其“流动效应”假说的前提。他认为“在空间经济中,消费者不可避免地要显示其偏好,空间流动使得地方公共产品成为私人市场上购物旅行的对应物”。这样,具有相同偏好的居民就会最终流入同一社区,每一社区不同的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用和居民为此承担的税收成本就会达到均衡。

本文试将公共产品引入空间维度中,并借助空间经济学的理念和分析方法考察公共产品效用的空间形态及其对共同消费的影响,主要有效用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匀质性及由此在非排他消费中引起的另一种性质的竞争;群体生活中个体外部效应聚集所形成的共享公共空间及其对公共生活质量的价值;公共产品效用空间是否可以复制(标准生产),是否存在效用空间的独占性,垄断性公共效用空间所产生的公共租,这种公共租对级差地租的意义及其在现代公私产品配置中的作用等。这些内容是现有公共产品理论所忽视和未予回答的。

二、对公共产品效用空间的多角度考察

(一) 公共产品效用空间的基本度量

从空间角度来看待公共产品会发现所有的公共产品(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都是通过提供一定的效用空间来满足公共需要的。

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与覆盖范围有联系但稍有差别。覆盖范围往往侧重于受益对象的范围,效用空间则是效用本身所及的场效应。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度量,最基本的是从地理的(或物理的)效用空间与行政的(或制度的)效用空间两个角度来度量。

公共产品效用的地理(物理)空间是由公共产品的自然与技术性能的辐射范围决定的,因而,只要某一公共产品提供出来,其效用空间即随之形成,从这一属性度量的效用空间是纯粹的物理场量。例如,路灯的照明区间,防洪堤的保护区域,噪音污染治理与空气净化的区域等。而行政的(或制度的)效用空间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如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优惠政策,提供的治安环境等只能使该辖区的居民受益。通常人们可以从公共设施之类的公共产品中感受到公共效用空间的地理(物理)属性,而对安全、公正和秩序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所提供的效用空间却难以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从提供的角度看,地理空间从属于行政空间,因为在考虑某种公共产品提供时,通常是以辖区为基本供给范围的,但当某些公共产品的外部效应超过了辖区的地理空间,使辖区外的人也受益,就会出现地理效用空间大于行政效用空间,产生两者空间上的非对称性,这说明公共产品的行政效用空间是完全可以人为设定的,而地理(物理)的效用空间则不能完全受人的控制。

就某一行政辖区的范围而言,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并非单纯由某一公共产品给出,而是众多公共产品共同组合提供的,效用空间是由各类公共产品填充而成,由此形成公共产品效用在空间中的包容和交错,一般而言,行政性公共产品(安全、公平和秩序)的效用空间包括其他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

对公共产品效用空间还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度量,全国性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等所提供的效用覆盖全国,属于宏观空间,地区性的公共产品所形成的效用空间属于中观空间,而某一公用基础设施或集团共用品(俱乐部用品)则属于微观效用空间。

(二) 公共产品效用空间的场效应梯度

物理学将物质的存在分为两种形式:微粒和场。实物微粒的实物形态属于间断形态,场这种物质形态属于连续形态,场的概念表征了两种物理实在,即场和实物,场与实物之间没有可以明确区分的界面,场不可能离开实物,场与实物不可分。

公共产品的存在也可以分为实物形态和场形态,而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就是由这两种形态的存在构成的。公共产品的效用在空间上的分布并非总是完全均匀的,而是存在效用的场效应梯度,这是由制度、技术、地理方位等诸多因素单一或混合作用的结果。

例如国防,从效用上看一国境内的每个国民都享受到了国防的保护,安全似乎在一国的主权空间内是均匀分布的,实则不然。在和平状态下,考虑到战争多发生于边疆地区,一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一般会选择内地,边疆通常成为不发达的地区(如我国的“老、少、边、穷”);更直接地,边民比内地居民更易受到邻国或外国武力威慑的恐吓,从而付出更多的精神成本,更不用说小规模边界摩擦冲突所带来的损失。可见,边疆居民在落后环境下和内地居民在繁荣状态下所享受到的国防安全是大不一样的。如发生战争,国防在战争区呈现为武力较量场,该区居民或者搬迁或者忍受战争之苦,而非战争区居民则享受到了国防屏障保护下的安全空间。

还有像一国的法度和秩序规范在一国应该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在一国不同的行政空间内,制度执行会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其中人为的因素很重要,而空间因素亦不可忽视,古语中的“山高皇帝远”就道出了君主权力随空间距离的延长而衰减的事实,这是由于空间距离的扩大必然加大行政系统层级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行政管理效力受到了空间屏障的分隔,为不同地方行政长官机会主义行为和经营地盘势力提供了有利空间。

在微观空间中,公共产品效用空间的场效应梯度更是随处可见:路灯的亮度会随距离而

递减,防洪堤的防洪效用对住在离堤坝近的居民大,远处的则相对小;公园和图书馆中的座位在位置上的优劣,观看焰火时视角与远近的差别等。这些都证明了某些公共产品的消费虽然是非排他和非竞争的,但由于效用空间的场效应梯度差别,在共同消费未达到整体的拥挤点以前,甚至空间非常充裕时,在局部优势空间先出现了拥挤点,这是另一种性质的竞争,即有效用空间差异所引起的竞争。

(三) 外部聚集效应空间公共产品

从效用空间考察还会发现群居的外部效应聚集所“提供”的有益的公共效用空间,从而扩大了公共产品的范围。蒂布特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分析贫民窟消失的外部效应时曾指出:“如果将这种外部经济包含在消费的定义中,那么,许多看起来不具备公共产品属性的产品就可以被认为是公共的”。外部聚集效用空间源于个体外部效应,但与通常理解的某种产品的外部效应不同,它不是个体外部效用的简单加总,而是聚集本身所形成的效用场,由于缺少效用空间的概念,这一类性质的公共产品常常被忽视了。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成概念中,公共领域包括公共场所、公民和公共舆论三个基本要素,在现代生活中,公共场所更多的意义在于提供公共生活的空间,而且主要是由聚集效应提供的,因而通常与城市的规模呈正向变化,其效应的大小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从这类“公共产品”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城乡差距在这方面难以消弭的差别。因农村人口稀疏,居住分散,较少形成公共设施的规模效应,也不会有人口集中的城市聚集效应,因此,农村通常缺乏只有城市才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生活空间,而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生活空间向人们提供的是“世面共享品”,城里人见多识广就得益于城市空间内的这类公共产品,这为城市市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信息、学习、合作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城市越大,这种“世面共用品”的价值就越大,这也是人们向往大城市生活的原因所在,而农村居民则因享受不到“世面共享品”而变为“乡巴佬”。

(四) 公共产品效用空间的复制、差异与独占

有些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可以复制,如公共绿地。可复制的公共产品所形成的效用空间通常存在效用差别,这种效用差别由很多因素决定。首先,一定的公共产品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存在的,而不同的地理空间在自然状态下就存在着自然差别,虽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改变或部分改变其自然状态,使之符合既定的标准,但是,有些自然因素是不能改变的,甚至是需要保护和加以利用的。其次,有些公共产品是在一定的历史继承和环境下提供的,从而带有特定历史区位所具有的特色。再有,从提供者的角度,公共产品效用空间的趋同与差异都是提供者追求的目标,趋同性是由某一时期内流行的观念所决定的某种政治偏好决定的,另一方面,趋同性本身有时就蕴含着差异性的追求,如同是建设“花园城市”,各地城市政府一定会因地制宜致力于打造自己“花园”的亮点,在某些地方超过别人。另有一些基于垄断性的资源提供出来的公共产品,其效用就不完全是人为努力所能产生的,因此其效用空间不能复制,该效用空间具有独占性,如天安门广场、位于滨海的景观空间等。

三、公共租与级差地租新解

(一) 公共租范畴

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虽然是开放的,但是,第一,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仍然存在有限性;第二,由前面的分析得知,某些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存在场效应梯度;第三,某些公共产品的效用

空间具有差别性与独占性。以上三点虽然都决定了共同消费中拥挤点的存在,但显然在后两种情况下更易出现。

关于拥挤型公共产品的理论只是一般地分析了有明显有限效用空间(空间较小)的混合物品的消费竞争性,但没有进一步考察后两种情况,虽然后两种情况在现象上也可能会出现拥挤点,但这种拥挤并非是直接源于空间的有限性,而是效用空间的场效应梯度和特定效用空间的差别性与独占性,这种区分对分析公共租有着重要意义。因拥挤而引起的竞争是产生公共租的必要条件,假如拥挤只是特定时间内的暂时现象(如城市中车流高峰期的塞车),或可以通过增加公共产品的数量加以缓解或消除,就不会产生公共租,只有具备另外两个条件: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具有某种差别性、独占性和存在大量的希望移入并长期居住该空间的需求者,才会产生公共租,其中又以第二个条件为最重要,因为公共租是由进入者支付的。本文提出的公共租是指在某一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形成后,因其效用空间的差别性和独占性而导致效用垄断,在存在大量需求的情况下,必然引起其效用空间的稀缺和升值,从而要求进入者必须支付较高的进入成本,其超出享受一般公共产品的部分就是公共租。为了进一步说明,必须区别两种情况:先占者和进入者,对进入者还必须进一步区分为临时进入者和长期定居者。

先占者是指早期进入某一公共产品效用空间的人,他们最有可能占据最有利的空间位置,如果先占者很少而最有利的效用空间相对充裕,先占者只能得到有利位置带给他的效用,并不能因此而获得租收入。随着后进入者的增加,先占者与进入者在拥有公共空间资源方面不但会产生竞争,而且还必然会出现权利的不平等,这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占座现象中最常见,公共汽车上和公园里的座位等都是按着“先来后到”的原则分配的,虽然大家支付的消费价格是相等的,而座位也是公用的,但是因先占和后进的不同,在享用公共空间资源上就出现了不平等。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是决定后进者必须支付进入成本的重要原因。对于进入者还必须进一步区分临时或偶然进入者和长期定居者。对于前者,由于在公共效用空间中逗留的短暂性,他有可能不需要或仅在购买某些私人用品或服务的价格中支付这种公共租,而后者因要在某一公共空间中长期留住,因此需要支付公共租才能取得长期的居住资格和权利。

以下举几个案例来说明公共租。

案例一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经营城市”的一般模式是:通过市政投资或出让土地使用权引入非政府投资者,按着政府制定的城市规划对城市的基础设施(道路、广场、绿地与园林景观、河道桥梁等)进行整治和建设,或拓建城市新区,来优化城市的公共空间的效用,提高城市的品位,由此使城市的整体空间的价值上升,甚至使原来价值低廉的土地变得寸土寸金,最直接的表现是地价和房价的上升(公用土地与私人房产同时涨价),间接的是带来该空间中某些私人产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坊间流传的“宁要北京的一张床不要外地的一间房”,反映的也是因北京与外地的公共生活空间效用的差异所带来的私人产品(床与房)在不同空间中价值的改变,这样进入者就需要在支付一般正常价格的同时,还需要支付超过部分——公共租。对于临时进入者来说可能表现为支付高的商品或服务价格(如天安门广场上高出几倍价格的大碗茶)等,对于移入的长期居住者,最直接和主要的是要支付地价和房价的上涨部分,由此形成了所谓经营城市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进入者所支付的公共租可用于弥补该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此时,该公共产品的表面提供者(最初提供者)和最终提供者就出现了不一致:进入者成为公共产品的最终提供者。例如原居住者附近的公共空间效用提高(如变清的河水、新拓宽的马路,新建的园林景观等)使其拥有的房地产升值,当其向进入者转让其房地产时,进入者就

必须支付因此而升值的部分。

案例二 在国际移民中,发达国家或制度优越的国家通常拥有优越的行政效用空间(公平高效廉洁的政府和良好的治安环境)和聚集效用空间(优秀的文化传统、诚信和睦的民风),还有先进发达的公共设施和宜人的生活环境等,这些构成了独具魅力的综合公共效用空间,因而成为移民的热点。但国家对移民是有标准的,如所谓的技术移民条件,对移民的学历和技术专长有具体的要求,而达到这些标准是需要付出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可以视为是进入的成本(对先占者不能提出此要求)。因该国引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增强了本国的科技竞争力,这是另一形态的公共租收入。

案例三 我国曾在一些大城市对新迁入人口实行过征收“城市增容费”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提高迁入成本来减少迁入者所带来的拥挤,并为扩大城市公共空间积累资金。迁入者的动机虽然复杂,但在向往大城市的优越公共生活空间上则是共同的。“增容费”是直接的公共租,它体现了公共租产生的基本条件:公共效用空间的有限性及由此引起的竞争;先占者和进入者享受公共效用空间资源的权力不平等。虽然目前城市“增容费”已经取消了,但是,城市增容的客观现象还是存在的,即使政府不再以规费的形式获得直接的“增容费”,但仍可以从其他的渠道获得间接的公共租收入(例如,北京在取消增容费后曾规定对外地人购房要征收0.3%的在京购房手续费;很多城市只对有本市户口的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的规定,使得“外地人”必须高价购买商品房才能安居乐业,其支付的价格中的一部分就是公共租)。

由上述案例可以发现,获得公共租的边界与差别性和独占性公共产品稀缺的效用空间(地理的、行政的和聚集效用的)是一致的,因此位于这一效用空间内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获得公共租收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由进入者支付的进入成本并非全部是因公共产品的效用空间升值产生的,但其中大部分应归入公共租。

(二) 公共租对级差地租的新解

地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以下简称古典级差地租理论)将级差地租分为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Ⅰ是以等量资本投入等量面积,但因丰度和位置不同的土地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级差地租Ⅱ是以等量资本连续投入同一块土地上产生不同的生产率所形成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古典级差地租理论主要是在分析农业中的地租问题时建立起来的,且这种地租主要是和投资效益联系在一起,地租收入只在投资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分配。运用这一理论显然已经不能解释空间效用改变所带来的租收入。典型的,在城市空间中出现的如下现象:因某些大型的公共设施如地铁、高速公路,公共场所如广场、大型公共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公园、绿地园林景观等的建设,其周边相邻的非投资者也会因此地段空间效用的改善使其所拥有的房地产价值骤然攀升,“出现投资于某一地块或地段的外溢现象,即引发周边或两边不同地块产生级差收益”。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或者将其归入级差地租Ⅱ。或把这种现象看做城市土地投资所特有的“地租效应扩散性强”和“积累性大”的功能,因而不仅会增加直接投资地块的级差地租,而且会提高相邻地块的级差地租,至于该级差地租是级差地租Ⅰ还是级差地租Ⅱ并没有说明。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些投资一般是在城市中投向具有强烈空间特征的行业或直接就是居民所需的公共产品,因这种投资空间效用的外溢对周边非投资者所带来的租收入无法用古典级差地租理论解释,而将其称为城市级差地租Ⅲ。

显然,这种城市级差地租Ⅲ在狭义上是由直接投资者所带来的空间外溢效益产生的,但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城市空间,而是将一切因公共空间效用增加或改善,或效用空间的差别性、独占性和不可复制性(如稀有旅游名胜地)而给该空间先占者所带来的收益都归入到这一新的级差地租类型,进而使级差地租Ⅲ的内涵扩大,用公共租的概念解释应该是更恰当的,因为公共租不是从投资外溢效用的角度,而是从空间效用的有限性、差别性和独占性角度揭示级差地租的新形态,进而使公共产品的空间效用成为决定地租的一个内生变量,也有助于揭示城市地租这一“世界之谜”。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M·蒂布特. 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J]. 吴欣望,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6).
- [2]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北京: 学林出版社,1999.
- [3] 王克忠. 试论城市级差地租Ⅲ[J]. 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 [4] 陈征. 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 [5] 饶会林. 中国城市管理新论[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6] 王克忠. 试论城市级差地租Ⅲ[J]. 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 [7] 王爱国. 都市土地地租新解[J]. 上海经济,2005(4).

储蓄(消费)理论的历史演进及述评^①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金融学院 陈 兵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李 莉

【摘 要】 储蓄(消费)理论是战后西方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介绍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提出以来储蓄(消费)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储蓄(消费)理论特别是预防性储蓄假说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 储蓄;消费;生命周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中国居民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 9.7% 的平均增长速度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居民储蓄持续高速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从 1978 年的 210.60 亿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17.25 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期 GDP 平均增长率。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通货膨胀率的迅速下降,经济的降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如 1996 年起连续 8 次利率下调,并于 1999 年征收利息所得税;1998 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力发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等政策。但近几年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过度依赖投资需求和净出口的拉动,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平均储蓄倾向呈上升趋势。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存款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消费需求不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金融业发展失衡,证券、保险业发展滞后等。在负利率的情况下,储蓄存款还将受到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学者开始积极关注中国居民的储蓄消费问题,将储蓄(消费)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运用于分析解释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以期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供科学的建议。

二、储蓄(消费)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 生命周期假说

受 Irving Fisher(1930)、Umberto Ricci(1926a, 1926b)和 Harrod(1948)的研究工作启发,20 世纪 50 年代,Modigliani 和 Brumberg 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 LCH),并试图在生命周期假说基础上建立一套消费理论来完善 Keynes 的消费函数。

LCH 认为:消费者将在整个生命周期时间跨度内依据其一生拥有的资源总量(持久收入)来安排他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通过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跨期消费的平滑)

^① 本文受上海市教委科研项目(06QS005)的资助。

实现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消费平滑能使得效用最大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效用递减。消费者将在高收入期多储蓄、低收入期少储蓄、退休期负储蓄来保持消费平滑,并假设人们储蓄主要是为了退休期的消费,由此得出 LCH 的一个重要结论:驼峰储蓄(hump saving)的存在。消费更多受到总财富规模的影响而不是受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的短期改变并不会显著影响当期消费。不仅收入和财富影响总消费,同时一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增长、年龄分布、总退休年龄和社会保障系统等也影响总消费。经济繁荣时国民储蓄率高,经济萧条时国民储蓄率低,即国民储蓄率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而不是国民收入的水平。

从 1957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Modigliani 和 Albert Ando(1957,1960,1963,1970)作了大量的经验分析(横断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分析),并逐渐放松生命周期假说的前提假设,引入很多影响因素(零利率、家庭规模、工作期和退休期长度、流动性约束、短视 Myopia、遗产 Bequest)来完善生命周期假说,特别是对遗产动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随着对储蓄消费研究的深入,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遭到了很多的质疑和反对。Poterba(1994)的实证研究发现驼峰储蓄并不存在,很多人退休后仍然保持正的储蓄,因此储蓄线并未向下倾斜。Deaton(1991)和 Carroll(1997)的研究表明,在存在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消费并非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平滑,而只是在很短的期间内平滑。此外,对储蓄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对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二) 持久收入假说

Friedman(1957)在《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PIH)。持久收入假说假设大多数人偏好于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消费者更多的关注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并将消费保持为持久收入(预期的一生平均收入)的某一比例。由于消费者并不能确切知道持久收入为多少,任何时候他们仅仅知道实际的当期收入和过去的收入,因此每一次收入改变,他们都不得不判断这种改变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如果他们断定收入改变是暂时的,那么持久收入将不受显著影响,消费者不会改变目前的消费模式;但是如果消费者断定收入改变是持久的,那么他们将调整相应的消费,这就意味着消费行为比收入更加平滑。但是,由于消费者几乎不可能确切知道收入改变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所以他们往往不能及时调整当期消费,即消费调整滞后。

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是两种互补的储蓄(消费)理论,两者有很多相同的结论和政策含义,通常也被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

(三) 随机游走假说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经济学家主要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理论框架下研究储蓄消费问题,对这两种理论进行补充和验证。Hall(1978)在 Lucas(1976)批判的基础上,将理性预期方法应用于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提出了革命性的随机游走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 RWH)。随机游走假说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消费的边际效用服从随机游走,消费也服从随机游走。在假定实际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可得到:

$$C_{t+1} = C_t + e_{t+1} \quad (1)$$

其中: C_{t+1} 是 $t+1$ 期的消费; C_t 是 t 期的消费; e_{t+1} 是误差项。从(1)式可知,决定当期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前期的消费,消费与滞后的收入无关。

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检验,发现消费与劳动收入的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他将上述发现称为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sensitivity)”。很多经济学家如 Daly 和 Hadjimatheou(1981)、Cuddington(1982)、Hall 和 Mishkin(1982)、Johnson(1983)、Muellbauer(1983)利用一些发达国家的数据对随机游走假说的检验都拒绝了这一假说。Campbell 和 Deaton(1989)利用二阶自回归过程很好地模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劳动收入的时序数列,研究发现,实际消费变化的标准差远小于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得出的理论估计值,这一现象被他们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smoothness)”。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一起构成对随机游走假说的挑战。

(四) 预防性储蓄假说

许多消费方面的经验研究发现,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消费并非是平滑的,这也是 LCH 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s hypothesis, PSH)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和消费者跨期选择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是为了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平滑消费以使消费效用最大化,同时也是为了防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Leland(1968)首先对预防性储蓄进行了分析,他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未来不确定性而引起的额外储蓄。在理性消费者假设下

$$U'(C_1) = E[\beta(1+r_1)U'(C_2)] \quad (2)$$

其中: C_1 为第 1 期的消费, C_2 为第 2 期的消费, β 为贴现率, r_1 为利率; E 代表在第 1 期的预期。假设效用函数 $U'(C) > 0$, $U''(C) < 0$ 。当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 $1/\beta$ 等于 $1+r_1$ 时,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满足:

$$U'(C_1) = EU'(C_2) \quad (3)$$

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未来边际效用的预期等于当期的边际效用。由绝对风险厌恶 $r(C) = -U''(C)/U'(C)$ 递减可得:

$$r'(C) = \frac{d[-U''(C)/U']}{dC} < 0, \text{ 即 } \frac{U'U''' - U'^2}{U'^2} > 0 \quad (4)$$

由于 $U' > 0$, 所以欲使(4)式成立,则必须要有 $U''' > 0$, 即消费的边际效用函数是凸函数。当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时,有

$$EU'(C_2) > U'E(C_2) \quad (5)$$

由(5)式和(3)式可知, $U'(C_1) > U'E(C_2)$,

因此有

$$E(C_2) > C_2 \quad (6)$$

(6)式意味着消费者预期未来消费大于当期消费,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者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确定性条件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不确定性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越大,越能吸引消费者进行储蓄,这种增加的储蓄也是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击。显然,相比确定性条件,消费者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为更加谨慎。假定在确定性条件下第 t 期的消费为 \bar{C}_t , 而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第 t 期消费为 C_t , 则定义预防性储蓄 S_t^p 为

$$S_t^p = \bar{C}_t - C_t \quad (7)$$

Sandmo(1970)利用两时期模型得出了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使消费者减少消费增加储蓄。Miller(1974,1976)和 Sibley(1975)将此研究推向了多时期的情形,得出了凸边际效用函数是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条件的结论。Caballero(1990)的研究表明,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和未来劳动收入变化量的方差越大,最优消费路径的斜率就越高,预防性储蓄就越大。Deaton(1986)的研究发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费路径的实际斜率明显高于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得出的理论值,预防性储蓄假说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Zeldes(1989)和 Caballero(1990)的研究认为,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而 Deaton(1991)的研究表明,美国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只拥有很少的财富,这一现象难以用预防性储蓄假说解释。

不少学者对预防性储蓄假说的经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kinner(1988)使用职业间的收入差异代表不确定性,通过对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的分析,没有发现有预防性储蓄动机。Guiso(1992)使用个人资产的差异代表不确定性,研究发现预防性动机仅占美国家庭净资产的2%。Dynan(1993)通过解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把预期消费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消费者的相对谨慎系数,通过对1985年美国的消费者支出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美国消费者的相对谨慎系数很低,由此推论出美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弱,预防性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也较低。Carroll(1993)对美国消费者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的分析,则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

部分学者如 Xiaonian Xu(1995)、Carroll 和 Kimball(2001)将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约束假说结合,来解释消费者的储蓄消费行为。

(五) 流动性约束假说

对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除了用短视(Myopia)来解释外(即消费者不能正确的预期未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用流动性约束假说(liquidity constraints hypothesis, LCH)来解释。流动性约束通常被理解为消费者不能利用消费信贷进行负债消费。据 Stiglitz 和 Weiss(1981,1983)研究,流动性约束源自信贷市场的不完美和不完全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借出方不能确定借入方是否能按约还债(而依靠这种债务才能使借入方保持最适消费水平),于是信用配给(credit rationing)发生,借款数量达不到消费者期望水平,消费者将面临借款约束,这将迫使他抑制消费。

Zeldes(1989)的研究证实了美国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流动性约束假说认为:(1)在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只能消费当期的财富,消费必然降低。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与当期劳动收入高度相关,这就解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2)消费者一旦预期到未来会面临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就会被迫减少,储蓄增加。(3)如果消费者在 t 期面临流动性约束,他在以后各期的消费都必然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初始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从 $t+1$ 期开始的最优消费路径。

Deaton(1991)和 Carroll(1992)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假说,提出了“缓冲存储(buffer-stock saving)”模型。在缓冲存储模型中,消费者储蓄的目的是使消费免受未预期的收入波动的影响。该模型假设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时间偏好,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呈现向下倾斜的形状。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或负债消费的成本高,消费者的当期最优消费主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使消费对收入表现出“过度敏感性”。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作用,意味着消费者不是用尽全部的当期收入,而是进行数量较少的储蓄——缓冲存储,以防未来收入波动的影响。Carroll 利用该模型解释了美国经济的一些现象,如:为什么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收